

安康与巴蜀文化

市直 谭波才 何媛媛

安康现当代文学人物回望：

曾德强



曾德强 1958 年 7 月出生于紫阳县蒿坪镇，其成绩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上。现为中国作协会员、省民协理事、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市民协主席。曾任市作协副主席、首届《中国作家》签约作家等职。

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磨砺出了他勤劳、刻苦、踏实的品性，有一种悲悯情怀和不懈奋斗的精神。由于天生对文艺的爱好和老师的引导，他成了文学的圣徒。1974 年 4 月上高一，被语文老师付培德带着参加紫阳县文化工作座谈会，同年在县办文学刊物《山花》上发表诗歌，开始文学创作。随后，他任中学教师、编辑记者，进而成为县级部门负责人、市人大机关处级干部，逐渐成长为一个颇负盛名的作家。

作家靠作品说话。曾德强累计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和网络发表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文学作品近 400 万字，出版长篇报告文学《路在路上》《巨变》、散文集《品茶论道》等个人专著 15 部。

曾德强的批判性报告文学反响巨大。十几年前发表的《中国之痛——医疗行业内幕大揭秘》《关乎生老病死——中国医疗卫生透视》等医改题材系列报告文学，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反响，被《南方日报》《深圳晚报》《西安晚报》《中外书摘》等多家报纸杂志全文转载或选载，《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予以评介。

《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引发《北京文学》2007 年辟专栏开展为期一年的“中国医疗改革向何处去”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情报告（2006—2007）》（白桦主编）中，将此文列为 2006 年全国关注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的代表性纪实作品之一。钟南山院士读了《中国之痛》打电话给作者说：“一个圈外人土能写出这么一部信息量很大、现实性很强、思想很深刻的报告文学，帮助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应该表示充分肯定和真诚的敬佩。”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 2015 年为《曾德强文学作品评鉴》作序说，中国医疗服务已经有了显著改善，“这里面自然有媒体的功劳，也有曾经痛切疾呼的曾德强的贡献。”《中国旅游现状调查》在《北京文学》2009 年第 11 期头条发表后，被多家报纸转载，文艺评论家叶松铨称其“准确地拿捏到时代阵痛的穴位”。安康学院教授孙鸿评介曾德强的长篇报告文学《旅游万象》，说它是“一份来自旅游市场的病理报告”。作品体现出来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梁真鹏)

安康博物馆基本陈列获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吴荣军）日前，在中国博物馆协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开展的“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展示推介系列活动”中，安康博物馆基本陈列《秦巴明珠》斩获“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荣誉。

安康博物馆基本陈列以“秦巴明珠”为主题，由“天赋安康—安康自然资源展”“脉源安康—安康古代文明展”“筑梦安康—安康建设成就规划展”三大部分组成，综合展示安康“重要资源、重要历史、重要成就、重要规划”，勾勒出安康过去、现在和未来。

该馆始终秉承“城市会客厅”和“文化祠堂”的办馆理念，按照“文化引领发展、文化服务人民”的要求，加强资源挖掘展示利用，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努力做到常展常新，保持博物馆的活力，近年已推出各类展览 50 余个。深入挖掘整合地方特色资源，举办安康三线建设历程展、汉江文字石展、安康市家风展、安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常设专题展；围绕建党、建国、抗战

胜利、改革开放和重大节庆等纪念庆祝活动，策划举办了“安康抗战专题展”“安康革命文物图片展”“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成果展”等一批重大题材临展。展览内容涵盖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自然资源、非遗民俗、家风家教、红色革命等，实现资源整合与一站式文化消费，提升了场馆利用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同时，引进优质展览资源，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唐代壁画名作摹本特展”，与耀州窑博物馆合作举办“耀州窑历代陶瓷精品展”，与十堰市博物馆合作举办“酒瓶艺术精品展”，与社会收藏机构合作举办“安康民间收藏佛像精品展”等。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联合“丝路遗风暨宝贝回家文物精品展”，与西安原浩华藏博物馆合作举办“丝绸之路的璀璨文明展”，与吐鲁番博物馆合作举办“新疆吐鲁番汉唐文物精品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弘扬丝路精神。

派孟涂“司神于巴”。到商代，巴人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版图包括今汉中、安康、鄂西、川东等地区，建立起了令商王朝所忌惮的“巴方”。武丁时期，妇好曾多次率兵征伐巴方，甚至与商王联合进行“伐纣”，最终巴方战败而被迫向商王朝纳贡服役，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妇其从征伐巴方，王自东受（彘）伐，戎陷，于妇好立”等记载。此时期，川西蜀人也已向汉水上游地区流动，出现巴人、蜀人混居的现象，商王亦派兵征伐，甲骨卜辞也有“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等记载。

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陕南对川渝地区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特征更加明显。通过对比研究，不仅发现汉阴阮家坝、紫阳马家营、白马石等夏商时期遗址的文化特征与鄂西三峡地区塘坊坪、中坝子、白庙、路家河等遗址的同期文化特征诸多相似，证明汉水上游巴文化与鄂西三峡早期巴文化属于一个文化体系，而且还与成都平原新繁水观音、广汉中兴场、三星堆等同期文化关系密切，说明汉水上游夏商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特别是白马石二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陶器都有高柄豆、尖底罐、觚形器座、袋状锥形器足等类型，在纹饰上以素面为主，弦纹次之，还有一定数量的划纹、圆涡纹、戳印纹。继白马石文化后，以商代遗址为主的宝山文化进一步加强了对川渝地区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夹砂陶器以褐陶为主，以釜作为主要炊器的特点与鄂西路家河二期遗址相似；骨发饰、高柄豆、陶器的贝纹、人字纹、目纹，与三星堆文化相似；小底尊形杯、高柄器座、圈足罐、釜等陶器出现于川西十二桥文化和甘南寺文化；三角援戈、深茎钺、面具（脸壳）等青铜器在彭县竹瓦街、三星堆等遗址中发现。

两周时期

西、东周时期，安康与川渝地区联系更为紧密，成为巴、蜀参与中原王朝政治、军事活动，中原王朝势力渗透巴、蜀的“双向通道”，同时也推动巴、蜀从弱小走向强大，由地方多元融入华夏一体。

西周时期，巴、蜀在不断迁徙和整合中发展壮大，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因巴人“歌舞以凌殷人”，战功卓著，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将其纳入“宗姬”系统，视为周之南土。至西周中期，巴人仍然是周王朝的重要护卫力量。1986 年，在汉滨区王家坝遗址出土一件青铜簠，内有铭文 93 字，是迄今陕南出土文字最多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卢、虎联合杞夷、舟夷侵略周朝东土，周王派师谷和史密平叛，后因取得胜利，特作簠以赏赐。

春秋时期，周王朝日渐衰微，而巴、蜀日益强大，以陕南为基地，竭力扩张势力范围。其中：巴虽与周仍保持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班倭秦、楚，示旬、卫士”，但先东渡汉水，与邓国相争，后与楚国缔结军事联盟，参与灭夔、庸战争，势力进入峡江地区。春秋中后期，巴、蜀开始衰弱。公元前 477 年，“巴人伐楚，围鄢”，但“楚公孙宁、吴由于蒍国，败巴师于鄢。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不得大壮。巴南下长江干流，转入鄂西、

重庆和川东地区，与商代晚期流徙于此的巴人会合。

战国时期，巴、蜀成为秦国从汉水、长江两个方面进攻楚国的战略要地，以期实现“（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封子通国为蜀侯。后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封其为“君长”，置巴郡。公元前 308 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此时期，巴人虽然主体迁徙，但仍有一部分巴人在安康一带活动，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迄今先后出土了斧（舌）形铜钺、虎钮铎于、虎纹戈、柳叶剑等青铜器，与清江、川东地区一脉相承，共同见证了巴国那段“战争岁月”。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巴、蜀的国家形态虽然已灭亡，但它们的种族和文化仍然存在，不仅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力量，而且还是推动中华文化“大一统”和民族“多元化”的重要支撑。

秦灭巴蜀后，屡次向巴、蜀地区移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造，特别是推行的羁縻制度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边地治理开启了制度之先河。秦惠文王时期，以巴蜀地区“戎伯尚强，仍移秦民万室之”。秦始皇时期，将大量富豪、强宗及流徙迁往巴蜀，加强地方统治和开发。西汉王朝建立后，延续秦王朝移民巴蜀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卖，推行儒家思想，全面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集权。尤其是东汉末年，张鲁割据汉中，大量移民涌入巴蜀地区，为缓解社会矛盾做出积极贡献。《三国志·魏书》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巴、蜀独特的区位和经济优势，使其成为秦、汉王朝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力量，以至于后世得出“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的结论。在秦并六国时期，巴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的粮食、蜀锦、井盐和其他军用物资，成为秦国战略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秦王朝统一大业。在楚汉战争时期，巴蜀地区源源不绝的兵员和军需物资，奠定了刘邦“还定三秦、天下可图”的物质基础。汉王朝建立后，巴蜀地区还数次解困国家于危难之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高祖二年（205 年），“关中饥，粮乏，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华阳国志·巴志》写道：“孝安帝永初二年（108 年），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不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

秦汉以后，巴、蜀文化特征渐行渐远，但至今安康仍保留“畚田火耕”“干栏式建筑”“悬棺（崖墓）葬”等历史印记，以及“质直好义”“尊祖重孝”“尚乐好逸”“信实重祀”等文化基因，成为巴、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也为安康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滋养。



虎钮铎于

巴蜀式钺

戈

柳叶形铜剑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有着悠久、丰富、独特的文化始源和文化模式，不仅是西南文化区系和长江上游文明的核心区，而且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康横亘于四川盆地、三峡与关中、中原地区之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交流通道，在其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史前时期

据考古发现，至迟新石器中晚期，以安康、汉中之中心的陕南从嘉陵江和三峡区域向川渝地区进行文化“传播”和“涵化”，促使巴、蜀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逐渐形成同根同源、同质同体的文化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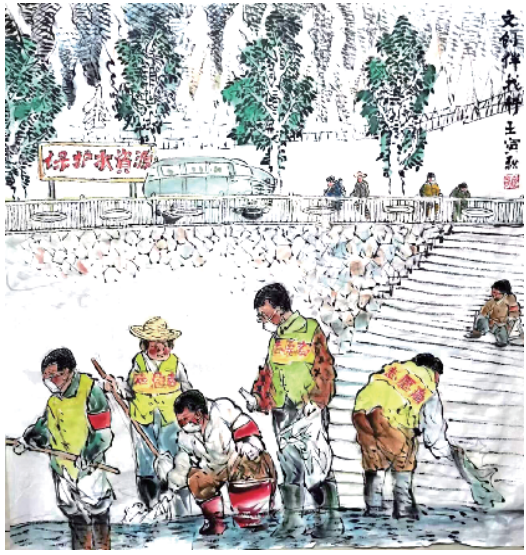
嘉陵江是甘陕、关中、陕南与川渝地区连接的天然通道。目前，在嘉陵江流域先后发现广元中子铺、巴中月亮岩、阆中蓝家坝、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等众多史前遗址。如果按照考古年代排序，年代早的遗址大部分位于嘉陵江上游，年代晚的遗址大部分位于嘉陵江下游，文化序列和传播路径十分明显。其中：在中子铺遗址早期文化层中发现有类似陕南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距今约 7100 年至 6700 年）的小乳突状三足器；在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晚期文化层（距今 5300 年至 4000 年）中发现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泥质喇叭口罐、折腹盆、敛口钵等代表性器物，与陕南“龙山文化”的特点一致。对此，李水城认为：它最早在陕南形

夏商时期

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出现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新都马木椁墓地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重庆地区出现以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为代表的古巴文明。两者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成为引领长江上游文明的“双子星”。然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两者的始源都可追溯到陕南地区。

据文献记载，至迟夏代早期汉水上游地区便有巴人活动，与夏族关系十分密切。《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竹书纪年》还记载，夏朝的第一个国王启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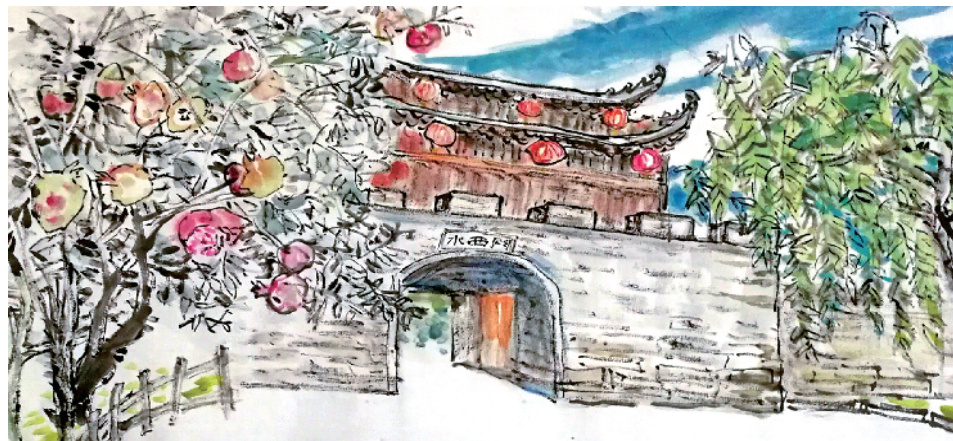
翰墨丹青心绘文明



文明伴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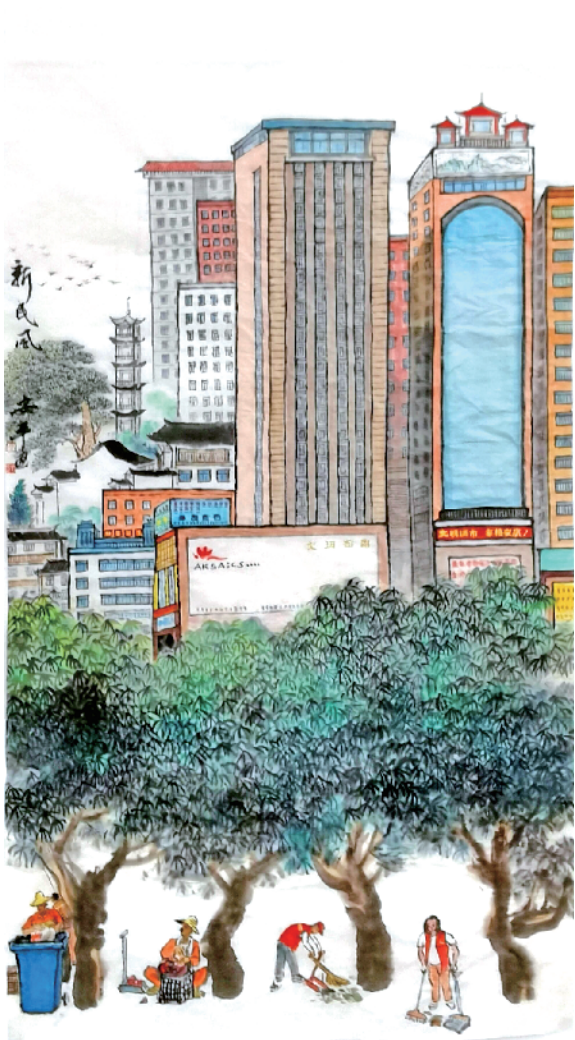


改善环境 邹定春 作



安宁康泰

申小荣 作



美丽家园

宋安平 作